

第一部



第一章 变故

1. “下江人”的学校

我母亲是一个小脚女人，裹过足又放足，虽然没有变成像粽子一样的小脚，毕竟是一双不入时的改组派的脚。父亲做了县官以后，她依然不在公众场合露面。

我的大姑比母亲小两岁，没有裹足，二姑、三姑也都没有裹足。母亲的娘家有些产业，是个破落的大户人家，老规矩多，到了民国，还给母亲裹足。张家几代人无任何不动产，生活、礼仪都不那么守旧，几个姑姑不仅没裹足，还进洋学堂念过书。母亲嫁到张家，在姑子们面前，旧时女人一个，抬不起头，凡事让她们三分。

父亲却一点也不嫌弃母亲。从外面回到家，见不到母亲，就要唤二太太、二太太，将母亲从厨房或后院叫到跟前，母亲的“跟屁虫儿”弟弟和妹妹也随之而到。父亲抱起他的娃儿亲一亲，同母亲打个照面、说几句话，才去干自己的事。“跟屁虫儿”这个词是父亲最先叫出来的，他很爱母

亲为他生的几个“跟屁虫儿”，以及母亲。

父亲很恋家，同母亲耳鬓厮磨，形影不离。一天，他拿回一张请帖，要母亲单独去参加一个典礼。母亲以为父亲又在同她开玩笑，没答理。可这次父亲是认真的，说道：“是惠娃的学校送来的请帖，我没有空，你去一趟，看看那所学校究竟如何。”父亲也是有意让母亲出去见见世面。

母亲一听说要她去看看我即将入学的学校，迟疑片刻，一反常态地说：“我去。”父亲怕母亲是一时冲动，过一会儿又反悔，故意逗她说道：“学校离县城很远啊，那边又都是些你没见过的‘下江人’啊。”故意将两个“啊”字拖得长长的，好让母亲再想一想。母亲说：“放心吧，我说去，就一定去。”

这是母亲第一次、也是一生中最后一次出家门到外面参加活动。她是为了我。

母亲要出门，身边的“跟屁虫儿”怎么办？父亲的意思是将娃儿们留在家里，由女佣刘嫂看着。母亲却说大一点的两个娃儿留在家可以，才一岁半的小弟弟毛猪（乳名）是个“粘粘”，整天粘贴着她寸步不离，她不在，小弟弟会哭喊。母亲不忍心，自己累就累点，那天早起抱着小弟弟走出家门，奔我的学校而去。

大约下午三四点钟，阳光还亮亮地照着纸糊的窗棂子，我在屋里隐隐约约地听见母亲和弟弟的声音，他们也该回来了。跑出房门一看，果然是他们。母亲的脚一瘸一瘸的，弟弟不肯走，要母亲抱。我瞪大了眼睛问：“妈妈，你的脚怎么了？”母亲答道：“不小心，脚跟踩到石板路的罅隙，崴了一下。”我赶紧把小弟弟抱过来，喊刘嫂过来将母亲迎回客堂坐下。

父亲还没有回来，母亲一面拍着小弟弟睡觉，一面同我

叙说那所“下江人”办的学校。

我要进的那所学校，是抗日烽火中，为从沦陷区流亡到后方四川的流亡学生设置的学校，最初叫第五中山班，1941年秋我插班入学时，调整为国立第十六中学女生部。从第五中山班起，她一直是直属于当时的中央教育部，校长和老师都是一些文化素养较高的“下江人”。

这所学校离合江县城 10 余华里，是在靠近长江边一座叫榕山的半山腰一块平地上。在一排老屋的后面有一片竹林，竹林深处，有从山石间流下来的清泉，一丝丝、一滴滴汇入一个大的蓄水池。母亲来到这里，只见山是碧绿碧绿的，蓄水池的水也是碧绿碧绿的。有人告诉她，全校师生饮用的就是这山泉水。

蓄水池不远处的岩石下，还有四四方方的一块石坪，上面刻有“天下奇观”字样的水槽，清泉流入水槽，据说有些骚人墨客在水槽内放一只酒杯，酒杯顺泉水而流动，曲折向前，最后停留在站立于“天下奇观”四个大字旁谁人的面前，谁就吟诗一首饮酒一杯。有人向母亲介绍，这里因此而叫流杯池。

母亲那天到学校，是参加该校由中山班转为国立第十六中学女生部的庆典。来宾们先参观教室，再到作为学生寝室的几个院落看看，又转到后山的竹林，一路看去，到处整整齐齐、干干净净。

母亲走进学生寝室，她看到室内除了一排排双层床外，墙上还整齐地挂着一长排蓝色的长方形布袋，上面用醒目的白线绣着学生的学号，房间过道和床底下，皆空无一物。学生进寝室就是睡觉，或从绣有自己学号的蓝布袋，取、放零碎东西。

学生的书本、文具都放在教室内的课桌里，整个白天和

晚上九点以前，学生都在教室上课或自习，很少到寝室来。学生的大件物品如箱子、被子等等，则放在指定的储藏室内。一位专管学生生活、寝容及卫生的女老师，学生管她叫“寝监”，兼管储藏室。她手里有一大串各寝室及储藏室房间的钥匙，到了开放的钟点，准时开放。

学生早起盥洗用的脸盆、毛巾、牙具，都整齐地放在寝室外走廊的木架上。

母亲还被领进参观展示学生学习成绩的陈列室，但她对陈列室的学生作业难得仔细地看，身边带着一个小娃娃，自己文化水平也不高，只是在陈列室里站一会儿就出来了，而对于学生寝室、盥洗室等生活设施和管理，则十分留意。她原以为这是一所收容从“下江”逃来的难民的学校，所以要亲自来看看。实地看了以后，她感觉这是一个文明的地方，一个生机勃勃的地方。她没想到那些“下江人”办的学校果真比合江县的中学办得好。

父亲回来时，饭菜已端上桌，只等他吃晚饭了。父亲问母亲到学校观感如何？母亲一面吃、一面说，说的都是对学校称心满意的话。二姑是重庆文德女中的毕业生，她问：“有文德女中好吗？”这可把母亲问住了，文德女中如何，母亲没去过，没法比较。要说比文德女中好，会伤了二姑。父亲察言观色，不等母亲说话，抢嘴说道：“我看中的学校哪还有错，你们还不晓得吧，从‘下江’搬来了国立武汉大学、同济大学、中央大学、交通大学，考上这些大学的，大部分是合川的国立二中、江津的国立九中、永川的国立十六中等一批国立中学的学生，惠娃子将来还有可能进国立大学。”

父亲说话，上气不接下气，还咳嗽，有些吃力。母亲望着我说道：“惠娃子，听见爸爸的话没有，要好好念书，将来还可能念大学哩。”母亲为我准备卧具等生活用品时，又

嘱咐我要好好学习，并且说这个学校不收本地人，要进去还不容易呢。

那两天，母亲满脑子都是学校，她第一次出去见世面，什么都新鲜。她又想起来了，对我说道：“那学校有一股子‘洋味’咧，放的音乐是洋歌，卡米、卡米，听也听不懂。一支用中文唱的歌是什么最后一枝玫瑰。”母亲从留声机里听惯了当时流行的《毛毛雨》：毛毛雨，下个不停，微风，吹个不停，哎呀呀，我的小亲亲……等粗俗的歌曲，没听过抒情的《老黑奴（OLD BLACK JOE）》、《最后一枝玫瑰》。我入学后，才知道美国黑人唱《老黑奴》中的卡米、卡米，是 I AM COMING, I AM COMING。《最后一枝玫瑰》是带一点忧伤的爱尔兰民歌。两张唱片都是校长从苏州带到四川的。

入学那天，父亲唤刘兴发送我到学校。刘兴发是我母亲一年前从安岳县带到合江的勤杂工，离安岳时，母亲同意他的女人刘嫂也同行。到了合江，刘兴发在县政府当“听差”。喊一声“听差”，不呼姓名，他就会答应“有”，听差就是等着差事。听差不只一个，所以不呼姓名。刘嫂在我家做女佣。

忠实可靠的刘兴发拎着我的行李，领我走到河坝头，雇了一只划子（小木船），船夫慢慢地向江心划去。划子离岸，从江上望合江县城，整个县城立于一座山上，鳞次栉比的房屋像是用木棍支撑着，险象环生。春天发大水，长江水夹带泥沙泛红色，此刻是秋天，已进入枯水季节，清凌凌的长江水缓缓地向东流去。划子划到江心赤水与长江汇合的地方，水流湍急，卷起白白的浪花，江水流速骤然加快，冲得划子上下颠簸。那船夫一只手把舵，一只手划桨，就那么几下，划子划过湍流，平静地落在缓缓的江水中继续前行，不一会

儿便停靠在流杯池江边。若遇上一个不识水性的船夫，也可能翻船。一年之中，总有那么一二次，尤其是春夏期间的洪水季节，坐划子可能遇险。

我们从划子跳上岸，走了一程石径小路，再气喘吁吁地爬两架陡坡，回望江边，那划子变成一个小点儿、几乎看不见。眺望对岸，青山缭绕，不见人烟。近处则茂林修竹，高大的榕树遮天蔽日。这儿的景致县城无法与之相比，我立即想到母亲那日到校，是否欣赏了这儿的风景？这儿山路难行，又没有挑夫和滑竿，她一双小脚，又抱着小弟弟，多么艰难才爬得上来啊！

再往前行，是一段平坦的石板路，两旁有梯田，刘兴发指着远处隐隐约约藏在树林中的一片老瓦屋说：“看，那肯定是‘下江人’的学校啦。”

没走到校门口，我便对刘兴发说：“你回去吧。”我心里想的是，不能像个大小姐一样出现在老师同学面前。我拎着过去从没有拎过的笨重行李，独自走到学校。

学校没有设门卫。一条笔直的不太宽的乡间土路，延伸到一架石坎坡前。土路左边有个很大的操场，操场边有茅草盖顶的一间间教室；土路右边有个花圃，花圃旁也有几幢茅草屋，其中较精致的一幢是教务处。这一片教学区，想象原来是一片田地，数年前兴办学校时，才在这儿平操场，建茅屋课堂。

从操场尽头的石坎坡拾级而上，进入二道校门。里面有石板铺的一个小广场、有影壁。第一进，两边各有一幢高大的瓦房；再上几级台阶，第二进，左右都有几重院落、几个天井，庭院有廊、有郁郁葱葱的常青树。院中还有一口水井，井旁有一株桂花树，散发出扑鼻的幽香。这几个小院落大大小小的房子是学生的寝室。在昆明的西南联大（抗战前

的北大、清华、南开大学)女生宿舍,原是一座祠堂,女生们就睡在尘封的神主牌位之间,比起西南联大女生的住宿条件,我们要好多了。想象龚慕兰校长在四川合江找到流杯池这个地址很不容易,它很像北京潭柘寺那样清幽静雅,但不是一座庙宇,而是文人墨客吟诗饮酒的地方。第三进,为正房,有客堂和宽敞的走廊,房后是后山和流杯池。校长和女老师们住在正房客堂两边的屋子,客堂是我们的音乐教室。后山上有一排茅草屋,那是男老师的宿舍。山上还有一个锅炉房烧开水、热水。下午三四点钟上完课,锅炉房便放热水供同学们洗用,那一桶桶热水通过从山上架设到二重院落的竹筒管道,流到学生寝室天井旁一个很大很大的木桶里。学校很讲清洁卫生,又都是些女孩儿,热水是不可少的。

我到校后,有位同学帮助我找到了校长龚慕兰。只见她约 40 来岁,清秀的脸庞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,高高的个子,白皙的皮肤,穿一身我少见的上衣和裙子。那同学将我领到以后,并不走开,站在一旁看看校长、又看看我。我敬畏校长,很紧张。还好,校长问清楚我是插入初中一年级下学期后,便对那位同学说:“你认识夏兰英吗?叫她来一下。”

夏兰英很快就到了。校长把我介绍给她,要她领我去办入学手续。兰英领我去教务处报到,然后在教室找到座位、寝室找到床位。她讲一口甜糯的苏州话,飞快,听起来很婉转,但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。此后,我不去找她,她也懒得来找我,我们没有成为要好的朋友。班上的湖北籍同学最多,同她们相处没有语言障碍,东北、华北的同学也没有语言障碍,但我在班上没有朋友。谁能跟我一样,周末就回家;县长小姐,养尊处优,多个别呀。

初到学校,我对同学“认生”,同学看我“特别”,彼此格格不入。

父母亲认为这所“下江人”办的学校很好，但我却觉不出它的好来。早晨吹起床哨 10 分钟后，就要从二重院跑到大操场去晨炼，体育课老师总是提前在操场等我们，一到齐，她就吹哨，喊一二一，领我们跑步、锻炼。冬日晨炼时，天未明，老师不点名，若趁机恋床多睡一会，不去跑步锻炼，那“寝监”女士查房立马会发现你，体育老师、训育老师也很快就知道你违规。上课更是不能迟到早退。学校对我们管得很严，我心里很不自在。

还有，课余时无论在哪里，都不许高声喧哗，或放声哈哈大笑；走路时不许吃东西，更不许边吃边吐、随地吐痰；坐在凳子上两只脚不许高高跷起、或跷二郎腿、或随意蹬在椅背上、墙上。这些细微末节的小事，校长和训导主任刘忆萱都看作是有关一个学生、一个学校的仪表仪容、校风校纪的大事。她们在讲话时，不止一次说道：“来学校受教育，要文明礼貌，走出学校，人家一看，上过学校的学生就是不一样，站有站样，坐有坐样。”

校长每天都要在学校四周转几圈，她的两只手背在身后闲步，看似悠闲的样子。遇有学生仪表仪容欠差，不吆喝、不咋呼，只是眼睛望着你，说一声多不美观呀！既没伤你的面子，你也就心悦诚服地改正。

我受了学校的熏陶，渐渐地改变了大小姐的一些坏习惯。校长曾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，留美归来，在苏州办学，任苏州女师校长；抗战后到大后方办流亡学校，仍沿着培养为人师表的教师的尺度来培养学生。

校长每天在学校转呀，转呀！哪个课堂教学秩序好，教员完全吸引住了学生的注意力，她心里会一清二楚。尤其是那一池清澈的山泉水，校长来回转悠，谁也不敢到那儿去打水洗衣物。

我慢慢习惯了学校的生活秩序，但伙食的清淡无法忍受。早餐，饭桌上空无一物，既无馒头、花卷之类的早点，也无小菜，不过是每人在饭厅的一个大桶里舀一碗稀饭。午、晚两餐也极为简单，不仅食无鱼、食无肉，且食无油，顿顿清汤寡水，过年过节才见荤。

大后方的高等学府、堂堂的西南联大，当时尚且发不出教授们的工资，学生的生活非常艰苦。我校是一所中学，生活待遇不如大学，其苦状可想而知。同学们流亡到四川，绝大多数没有经济来源，完全靠微薄的“贷金”维持生存。我有家，父亲每月有收入，为何要送我到流亡学校去吃苦？！在我馋得不行的时候，我真想转学到县城里离家近的学校去。但一回家见了父母，就没了勇气。一周接着一周，一月连着一月，等到了期中考试，三门主课数学、英语、国文，我两门不及格。到了期末，若再不及格，便要留级。

那个周末，我的心情极坏。天下着濛濛细雨，走出二道校门到教室去上课，土路泥泞，脚一落地，滑出很远，迈着戏曲演员那种细碎的快步，一歪一歪、一扭一扭地好不容易走到教室。这样的天气常常有，雾也很大。那天下午坐划子回家时，雾才刚刚散尽，天仍是灰蒙蒙的。要是上城里的学校，便不会走泥路，回家也方便。划子行上水，慢悠悠地，我忒不耐烦，嫌恶它的慢。

回到家，见了父亲，我想都来不及想如何措辞，便说出令父亲十分惊讶的话来：“爸爸，你让我转学吧！”

才一周没见，父亲已是瘦骨嶙峋，听了我的话，他喘咳不已。我以为他会像往常那样耐心地听我说话，问我为什么要转学，可是这天他只说了句最简短的话：“不行。”声音极软弱，但口气比石头还要硬。

不谙人事的我，也不看看父亲病成啥样了，要同他“讲

理”：本来嘛，我插班一开始，英语就比别人少学 10 多课，数学缺得更多；没学前面的课，后面的课怎么跟得上，我两门主课都不及格，你叫我怎么学呀。

父亲听我说两门主课不及格，连说：“没出息，没出息，两门课不及格，还好意思说出口，你还不好好赶一赶？”

我一定要父亲答应我转学，父亲不答应，我就伤心地在他面前哭得个昏天黑地。

母亲在厨房同刘嫂一起做晚饭，女儿周末回来了，晚饭总要比平时丰盛一些。她听见父亲书房这边的哭声，连忙走过来，一看，是我和父亲犟嘴。

父亲向母亲诉苦似地说道：“我病成这样，还来气我哟，你听听她说些什么话，要转学。”

母亲连忙把我领到堂屋，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发，用她的拇指将我额前的一绺头发捋到我的耳后，说道：“不要惹你老子生气，他现在病得不轻，生不得气了。”我歉歉了一会儿，止住了泪水。

母亲细听我说两门课不及格，怕赶不上才想转一个学校，宽解地说道：“还有半个学期哩，只要你努力，不一定会留级。就是留级，也不怪你。”

我的婶婶也过来劝我：“我们大姐姐顶聪明，平时功课不差，一时赶不上，不要急嘛。”婶婶随她的几个孩子，也叫我大姐姐。

我的弟弟、妹妹、堂弟堂妹，五六个娃儿都围在我身边看我，母亲和婶婶将他们支开，要他们一边玩去。

婶婶的娘家在远离城市的四川巴县西永乡下，是个彻头彻尾的乡下人，没念过书，但模样儿很俊，由她的姑姑做媒，嫁给叔叔。她寡言少语，人前人后从不拨弄是非。那天要是我的两个姑姑在家，就会有好戏看了，她们又会借机将

我母亲数落一气：看看她生的不成器的娃儿。叔叔、姑姑、姑父们每每要到开饭时间、大圆桌子上汤菜都摆好了，才会落屋。叔叔和姑父在县府做事，两个姑姑虽没有工作，但她们也很忙，忙于外出应酬打麻将，东家长、西家短地评论哪家的保姆同老爷通奸，肚子大了，哪家发了一笔财要娶姨太太。两个姑姑上过重庆很有名气的文德女中，能说会道；我的母亲和婶婶没上过学，足不出户忙于家务。一是劳心，一是劳力，劳心者高于劳力者，我的母亲和婶婶对姑子们总是“供着”，不敢惹她们。

母亲等弟妹们和婶婶退出堂屋，悄悄地对我说道：“妈知道你在校吃得差，以后我尽量做些好吃的，星期六等你回来就打牙祭。”说罢，母亲将她藏在柜子的顶层、以防弟妹们偷吃的润肺糕舀给我吃，说这是给父亲做的，因为父亲咳嗽，正害着肺病。这润肺糕其实就是将核桃仁、花生仁、芝麻碾碎，加上白糖、猪油，类似汤元芯子的一种甜食。由此可见家中经济并不宽裕，只有生病的父亲才能享受润肺糕。

然而，母亲并没有实现为我做好菜的诺言。以后的周末回家，父亲的病更加沉重，胃纳不佳，已不能上大圆桌吃饭，一日三餐都要母亲单给他做。不定什么时候，他说想吃某一样东西，说要，马上就要。那时候，没有煤气灶、电炉，火候不到，做得晚了一些，父亲便发火，吃食端给他，他心情平静不下来，也咽不下去。咽不下去，待一会儿饿了，又发火。如此折腾得母亲一天到晚手忙脚乱，加之家中的大伙食也不能不管，她哪儿还顾得上我。对于父亲的发火，母亲完全宽容地对我说道：“这都是你爸爸病重了才这样的磨人，又拖着这一大家子，他心焦哇。”

父亲想吃的东西越来越怪。那个周日，父亲起床，说要

吃鸡蛋冲藕粉。合江那个小县城很土，市面上没有小铝锅卖，那时更没有不锈钢锅面世，厨房只有一个大铁锅和一个烧开水的铜壶。鸡蛋冲藕粉只能烧开水冲在碗里。单冲鸡蛋花，可以；单冲藕粉，也可以。要将鸡蛋花和藕粉同时冲，就不容易熟。父亲端起碗，喝了一口，说不熟，又发火。母亲赶紧又去厨房另做。我跟着母亲到厨房，见母亲扑簌簌的泪水掉在灶台上。可怜的母亲每天的日子过得真是太难了。

父亲病重以后，同母亲分床睡，他们各住一间小屋。那天下午我返校之前，母亲不放心，把我叫到她的那间小卧室，再一次嘱咐我要安心在校学习。她凝视我片刻，说道：“娃娃，你到流杯池上学是比以前瘦些了，但你是在求学，学本事。妈妈当初若有书读，就不会像现在这个样子，依靠你爸爸，说不定靠山就要倒了，我看你们怎么办？”

靠山倒了，父亲殁了，母亲只说我们怎么办，没说她怎么办。我看见她的眼里包了一包泪水，扑在她怀里，叫妈妈，妈妈。

我心里想爸爸不会倒，医生给他看病、吃药，他会好的。母亲不是每天给他煎中药吗，我们都生过病，不是都好了吗。

那些日子，母亲魂不守舍，忙忙碌碌，几乎是奔跑于父亲病榻与厨房之间，我回到家，她已没有空闲同我说话。只是当我离家返校时，她依依不舍地伫立在家门口，看着我消失在县府大堂以外才回去。

2. 人间悲剧

隆冬季节，树叶飘零了。坐在教室上第一堂课时，感觉

冷飕飕的，手脚都快冻僵了。那日我们正在上英语课，校长转到我们教室这边来了。我坐在教室第一排靠门边的位子上，意外的是校长冲着我招手。

我走到校长跟前，校长对我说道：“你家里来电话，要你马上回去。”

我一听要我回家，非常高兴。可是校长却以怜惜的目光注视着我，说道：“你快回去吧。”当时我没在意，后来才明白这是校长对我的不幸表示同情啊！我毕竟是一个上初中一年级的女孩，也不想校长为何亲自来叫我，没有急事或要事，校长又怎么会随随便便叫学生出课堂。而我当时想的是母亲做了好菜，特意要我赶回去吃午饭，因为那天正好是星期六，是该回家的日子。

我连跑带跳，噔噔地一口气跑下山，来到江边搭乘开往县城的划子。坐上了划子，我又跳回岸上，因为到县城是逆水，划子走得很慢，所以我干脆沿江边步行走到赤水河边，再乘渡船过江到县城。

走到县府大门前时，离中午大约还有一两个小时。穿过县府三进大堂，快到我家时，远远地见刘嫂领着我的三个弟妹，呆呆地站在那儿，一动也不动。往日周末回家，弟妹们一准儿是在那儿活蹦乱跳、嘻嘻哈哈地玩耍。妹妹先看见了我，一下子扑过来，呜呜地哭起来，刘嫂上前来对我说：

“大小姐，你快回去看看太太。”

我走进堂屋，才知道大祸临头：我的母亲直挺挺地躺在一块门板上。家人告诉我，她在天亮前就断气了。

头天晚上，她吞了鸦片烟土自尽。

先是我不满三岁的小弟弟毛猪感觉到妈妈不在他身旁，叫妈妈没应声，哭了起来。哭声惊动了睡在隔壁屋的父亲，父亲连连地唤：“二太太，二太太，毛猪哭了。”父亲以为

母亲睡得太沉，醒不过来。弟弟的哭声、父亲的喊声，唤回了母亲求生的欲望，她告诉父亲自己已服毒。害着第三期肺结核病的父亲，赶紧叫人请来医生急救。医生来了，给母亲洗肠，母亲吐了一阵，昏昏睡去，谁知母亲从此再也没有醒来。

我趴在母亲身上，号啕大哭，直叫喊妈呀，你怎么忍心丢下我们去死呀。婶婶、姑母等把我拉开，全家人在客堂里哭成一团。两个弟弟的哭声更悲惨，婶婶、姑母不忍见小孩的恸哭，连忙吩咐刘嫂，将弟弟妹妹领到县府大堂以外玩去。

哭了母亲，婶婶、姑姑又同我一块去看父亲。父亲此刻躺在他的起居室。病人膏肓的父亲，眼睛伤着，脸色蜡黄，见了我，伤心恸哭已无泪，他的身体已似油干灯草尽。他想要坐起来，但已无力气了。

望着我，父亲想要说话，但不断地打嗝，不断地喘咳。姑母说：“早饭给他吃了点甜食，可能不受用，往上翻。”眼见父亲病重，又没了母亲的服侍，他还能拖多久，我欲哭又止，怕父亲难受。父亲喘咳停止，长叹一声：老天呀！让我再活两年吧，为几个娃娃挣出活命钱，我死也瞑目。

屋子里悄悄无声，大家相视无言。只有大姑母劝说父亲好好将息，不要着急。大姑母告诉父亲，文博（叔叔）已出去筹办丧事，请和尚来做道场，放焰口。

除此以外，父亲还吩咐由叔叔送母亲的灵柩回故乡重庆安葬，并通知母亲的娘家。只有父亲才能作出这样的决断。合江距重庆好几百里，灵柩上不了轮船，只有乘木船，要在长江上漂流好几天，到了重庆，再到我们家住的磁器口附近乡下找墓地，一路的花销很大，以当时家中之拮据，此举几乎倾家荡产。母亲死于非命，张家和母亲娘家素有龃龉，娘

家人若不依，谁能收场。

母亲比父亲大一岁。她家姓罗，比张家有地位，外祖父中过举人，在磁器口颇有一些产业，母亲自小是一位千金小姐。只因外祖父过世得早，家道中落，动产不动产皆坐吃山空，最后只剩下一处自家人住的一个大院子。张家也住磁器口，但祖祖辈辈房无一间、地无一垄，一家子十来口，单靠我父亲挣钱养活。

父亲因家里穷没念多少书，但他很勤奋，天分较好，在重庆市中心的市立第一小学做了一席小学教员，后又做了校长。父亲同母亲结婚以前，还结过一次婚，妻是父亲教书那所学校附近、一个姓周的人家。周家不看重钱财，重人品，是学校一位老师做的媒。父亲虽是清贫人家的子弟，但才貌出众、前途无量，周家美喻之为乘龙快婿。拜堂以后，父亲见周女子柔媚姣好，心想真是天作之合也。过了一年，周女子月经断绝，父亲和家人们都以为她是有喜。不曾想她患了妇女病，四川人叫干血癆，不到一年，红消香断，离父亲而去。

▶ 做小学校长时的父亲

